

“想象中国”何以可能

——晚清报刊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姜 红

摘要:晚清时期,新知识群体的崛起,现代印刷业的进步,报刊语言和文体的成型,都为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从“天下”到“万国”和“世界”,由历史循环论到历史进化论,晚清报刊的时空转换和时空想象同时也催生了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的形成。在办报办刊理念上,晚清报刊以“通上下内外之情”强国,以培育“国民精神”建立国家认同,以“改良思想”救国,以“正确、适宜”之独立言论报国,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晚清报刊不仅为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现实基础和观念前提,更为“想象中国”进行舆论造势,成为民族主义思潮勃兴的引擎和载体。

关键词:晚清;近代报刊;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民族认同;现代性;报刊史;新闻史

中图分类号:K251;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1)01-0136-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CXW004);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07JC86000);安徽大学杰出青年科学研究培育基金项目(SKJQ004)

作者简介:姜红,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安徽 合肥 230039)。

一、民族、民族主义:西方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互相建构

在近现代中国各种新观念新思潮的汹涌起伏中,有一种思潮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逐渐成为时代强音,它既能够转塑国族认同、凝聚集体意志,具有强大的群体动员及号召力量,也可能导致极端的排外取向、狭隘的文化自大,以及面对世界的“选择性失明”,这就是民族主义。余英时指出,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最大的动力,非民族主义莫属^①。李泽厚也认为,反帝救国的民族主义是整个近代中国思想之压倒一切的首要主题^②。

“民族”一词最早出现于南朝宋齐时期,在古代文献中既指“宗族之属”,又指“华夷之别”,与等级森严的“族类”观念相比,含义比较抽象笼统^③。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最早由梁启超于1898年从日语输入^④,其对应的英文是“nation”,而传统中文典籍中的“民族”二字不具有“nation”一词的现代内涵和现代性背景。所以笔者认为,“民族”一词就国人的理解而言,是一个现代性概念,但这并不是说传统文化中的“族类”观念对其没有影响。

民族主义起源于近代欧洲,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原生论或根基论(primitiveism)的民族主义观、建构论(construction-

①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历史月刊》(台北)1990年第29期,第144页。

②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453~468页。

③ 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郝时远:《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④ 详见[英]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0页;[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鲁忠慧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8页;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皇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

ism)的民族主义观。主张根基论的学者“依据若干根基性的判准如血统、语言、共同祖先、宗教、习俗等体质与文化的‘既定资赋’(physical and/or cultural givens),认定‘民族’乃是天然生成的人群区划方式,民族主义的感情与冲动也是与之俱来,绵延不绝的长期现象”^①。建构论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它绝非天经地义的自然事物,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与过程中,伴随着长期激烈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被建构出来的人为产物。民族、国家、社群等并非生而有之,它们可以通过诸如仪式、旗帜、民族服装、歌曲等具体象征物被想象,而这一想象与因文字出版而开辟的通讯方式有很大关系^②。安东尼·史密斯试图弥合两派的观点,他认为现代民族主义不可能凭空主观“想象”,只能在原有族群传统的基础上“重新建构”(reconstructed)^③。他所代表的“历史族群—象征主义”研究范式,既不将“客观”因素排除在分析范围之外,又给“主观”因素“如记忆、价值、情感、神话和象征等以更多的重视”^④。

笔者倾向于认为:一方面,任何关于国族的想象都不可能是凭空想象,任何关于民族主义的话语建构也不可能无中生有,必须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共同体的过去”作为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民族和共同体不可能存在于一成不变的环境和时代中,环境和场景的更替、情感的亲疏、利益关系的变化等,都可能影响一个民族对共同体的认同与想象。所以,民族主义既非自然的,又非虚构的,它是特定族群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重新建构”的产物。本文所谓的“想象”,正是在这种“重新建构”的意义上使用的。

20 世纪初的中国,伴随着现代意义上民族

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民族主义开始勃兴。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是一个散佚与传承的“复线历史”运动。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拥有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思想资源,一种是排他性的汉族中心的种族主义,另一种是包容性的以“天下”为价值诉求的文化主义,这两种关于民族共同体的叙事互相分离,又相互纠缠^⑤。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既受到外来观念的影响,又接续着本土的思想文化渊源。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与排满的革命派之间的论战,正是两种民族主义思想传统在现代背景下被“激活”后的交锋。在康有为看来,儒家思想作为特定的道德、文化传统,是数千年来中国赖以生存的根基与命脉。因此,文化民族主义观念所崇奉的,是对中国文化传统和道德秩序的认同与守护。而高举“排满”大旗的革命党人则选择了“血系”与“种姓”作为民族主义第一要素,形成“内攘蛮夷”以“自强保种”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尽管民族主义在其不同代言人那里有不同的侧重和表达,实质上,20 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种族革命的真正用意是政治革命。关于这个目的,孙中山表达得非常清楚,他在 1906 年《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上说:“最要紧一层不可不知: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主义推翻的是“把持政权”、“实行排汉主义”、“谋中央集权”、“拿宪法做愚民的器具”的满清政府。他强调:“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⑥。曾经力主排满的章太炎后来也解释排满宣传实为革命之

① 沈松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兼论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政治社会哲学评论》(台北)2002 年第 3 期。

②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叻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6 页。

③ 许纪霖:《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320~321 页。

④ [美]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60 页。

⑤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5~76 页。

⑥ 孙中山:《在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上的演说辞》,《民报》第 10 期,1906 年 12 月 20 日。

手段:“余身预革命,深知民国肇建之最有力者,实历来潜藏人人胸中反清复明之思想。”^①蔡元培更是一针见血,称排满乃是“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②。

有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观念类型和表现形式,中外学者已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不拟过多着墨。笔者的兴趣在于:既然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那么,时人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和情境中展开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谁在想象?通过什么方式想象?作为媒介的现代报纸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本文力图解答这些问题。

二、新知识分子、出版业、白话报、新文体:晚清报刊国族想象的现实基础

晚清以降,传统中国人“天朝上国”的文化想象受到来自西方的当头棒喝,几乎一夜之间,中国被置于万国林立、列强纷争、优胜劣汰、不进则退的尴尬情境中,构成前现代社会的社会意识的统一性日渐衰微,人们近乎凝固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变化给民族观念的形成提供了认识论上的先决条件。

研究欧洲民族主义的学者认为,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横向族群社群”(lateral ethnies)的道路,贵族阶层通过国家官僚体制,将底层和边远地区的民众整合进国家统治之中,英法等国的民族主义遵循的是这一路径;另一条是自下而上的“纵向族群社群”(vertical ethnies),受帝国统治的本土知识分子率先发起民族主义运动,提供民族认同的文化架构,及改变政治现状的动力,东欧地区走的是这一道路^③。笔者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更接近第二条道路,一批新式知识分子成为民族主义的“立法者”和“阐释者”,他们给国人提供了民族认同的知识和思想框架。

所谓的“新式知识分子”多有留洋经历,兼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据统计,到1915年,在美国专门学校及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已经超过1200人^④。1906年前后,中国留学生中有41.51%留学日本,33.85%留学美国,24.64%留学欧洲各国(德、法、英三国占多数)^⑤。如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所言:“正如压迫是自由主义的学校一样,流放是民族主义的摇篮。”^⑥这些新式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相比,具有更开阔的世界眼光,同时也在与“他国”、“他族”的交往中产生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他们是最早开始“想象中国”并建构民族认同框架的人。

这些新式知识分子能够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建构民族主义想象空间,依赖的物质基础正是安德森所描绘的大规模新式印刷业和印刷语言的传播力。安德森认为,民族想象当然不是虚构,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现代想象,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产生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过程中的深刻变化。其社会结构上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促成了拉丁文的没落与方言性的“印刷语言”的兴起,以印刷资本主义(尤其是报纸、文学和教科书)大规模的扩展为基础,形成的方言—世俗语言共同体,就是后来“民族”的原型。作为想象工具的语言和印刷文化构成了民族想象至关重要的媒介^⑦。中国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条件尽管与西方迥然不同,但其物质基础的具备却是必不可少的。

在近代中国,新知识分子们走上历史舞台,有两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其一是现代出版业的兴起。中国近代新式出版业最早由外国人创办,而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又往往

① 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天津大公报》1935年6月15日。

② 蔡元培:《释仇满》,《苏报》1903年4月11~12日。

③ 沈松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兼论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政治社会哲学评论》(台北)2002年第3期。

④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30页。

⑤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37页。

⑥ [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3页。

⑦ 吴叡人:《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

是报刊出版发行机构^①。19世纪70年代,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地的出版社(商)的印刷设备一直来自外国。一方面,近代报刊的发展成为引进国外先进出版技术和设备的动力;另一方面,出版技术和设备的引入又进一步推动了近代报刊的发展。

从近代中国译书的情况来看,1850~1899年,国人翻译的外文著作作为567种,其中日文著作86种,占15.2%;1902~1904年,国人翻译了533种外文著作,其中日文著作多达321种,占60.2%^②。从近代中国的期刊报纸来看,1900~1918年,在中国国内与国外各地区出版的定期刊物达七八百种之多^③。另据一项外国人所作的统计,1890年有通俗期刊15种,1898年增至60种,至1913年时已暴涨至487种。这些刊物的发行量参差不齐,畅销如《新民丛报》者,甚至可达1万份,阅读人数则在10万以上^④。国人两次办报高潮分别出现在1896年至1898年和1906年至1911年。据统计,从1896到1898年,全国创办的中文报刊有100余种;1906年到1910年,每年创办报刊100余种,1911年更达200余种^⑤。这些报刊以其惊人的流通规模,提供了“想象中国”的可能。

第二个条件是“报刊语言”的出现。对新式知识分子们来说,传统士大夫所使用的古文难以应付新时代的需要,难以实现通上下之情、教育国民之目的。因而,晚清以来各地纷纷创立白话报、俗话报,以拉近与启蒙对象的距离。《中国白话报》的创立者白话道人(林獬笔名)称,“我们中国人,向来是很有良心,很爱国家的”,目下“国事危险”,国人却“动也不动,响都不响”,“这个原因,都是为着大家不识字罢了!

不识字便不会看报,不会看报便不晓得外头的东西,就是大家都有爱国心,也无从发泄出来了”。他办《中国白话报》,为的是以明白晓畅的语言让“各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们,妇女们,个个明白,个个增进学问,增进识见,那中国自强就着实有望了”^⑥。办白话报,与其说为的是“增进学问,增进识见”,不如说是为了唤醒“爱国心”,实现“中国自强”。

两次办报高潮中的精神领袖当数倡导“文界革命”的梁启超,他创办的《时务报》最高发行量达17000多份^⑦。梁启超以其汪洋恣肆、挟雷生电的报章风格创立了“时务文体”,由《时务报》至《新民丛报》发展为“新文体”。梁文一出,海内观听者“为之一耸”,其光华泽被整个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思想界。钱基博认为“梁启超创新民之文体”,“斯亦我行我法,脱尽古人恒蹊者矣”^⑧。梁启超本人对他所创格的“新文体”也颇为得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道:“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数十。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⑨陈平原评价说:“晚清的白话文不可能直接转变为现代白话文,只有经过梁启超的‘新文体’把大量文言词汇、新名词通俗

①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11卷近代前编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97页。

②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01页。

③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说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页。

④ Charlotte Beahan,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Chinese Women’s Press, 1902–1911”, *Modern China*, vol. 1, no. 4 (Oct. 1975), p. 379. 转引自沈松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兼论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政治社会哲学评论》(台北)2002年第3期。

⑤ 史和、姚福申、叶翠娣:《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文中列举的报刊数,不含在国外办的中文报刊,所在地不明的也未计。

⑥ 白话道人:《中国白话报》发刊词,《中国白话报》第1期,1903年12月19日。

⑦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114页。

⑧ 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影印本,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482页。

⑨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5~86页。

化,现代白话文才超越了自身缓慢的自然进化过程而加速实现。”^①

新兴知识分子通过白话文的推广、白话报的普及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掷地有声、热情洋溢的报刊文体,最大限度地争取报刊读者,传播新兴观念。而新知识群体的崛起、现代印刷业的进步、报刊语言和文体的成型,都给“想象中国”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三、从“天下”到“世界”,从“循环”到“天演”:晚清报刊国族想象的时空情境

没有主权“国”之观念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世界”观念。在传统中国的文化观念体系中,甚为发达的是“天下”观。按照张灏的说法,传统的天下观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哲学层面,支配中国人世界秩序观的是天下大同的乌托邦理想;第二个是政治层面,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是以中国为地理中心的华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②。柯文也认为:“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天下’,这种世界观的关键因素是毫不犹豫地坚信中国的中心性,在地理层面上,普遍认为地球是平的,中国居中央。这种地理中心感有与之相应的政治观,即在一个安排恰当的世界中,中国将是权威的终极源泉。这一大厦建筑在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上,它相信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是人类永久的合理性,中国的标准就是文明的标准;成为文明人就是成为中国人。”^③

从空间概念上看,“世界”与“天下”的区别在于:“世界”由“万国”组成,是一个无所谓“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形态。而传统中国之“天下”,则蕴含着以华夏为中心的地理与文化优越感——中国处于一个至高无上的中心位置,

以华夏为中心进行空间外推,所有其他国家不是藩属,就是未开化的蛮夷。明朝末年,利玛窦在中国所见的“世界地图”具象地再现了前近代中国人对“天下”的看法。在这幅地图上,大明帝国的15个省占满全图中间部分,四周环绕大海,海中散布若干小岛,各标以中国所知其他各国之名,这些岛加在一起的总面积,还比不上中国最小的一个省,这就是“天下”^④。

19世纪末,西方地理学知识的引入颠覆了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念^⑤。皮嘉佑在《湘报》中形象地告诉国人:“若把地图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⑥这种常识的普及虽一度引起保守派非议,但阻止不了中国人“世界”意识的产生,进而才能有“东方”与“西方”、“我族”与“他族”的“认同”与“认异”。正如张汝伦所说,“只是在真正有了世界之后,中华民族才真正有了自己”^⑦。

从时间概念上看,在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人的观念中还没有“进化”、“进步”的信仰,中国传统史观表现为历史循环论甚至衰退论。深谙中西之“道”的严复这样比较中西观念之不同:“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⑧

作为一种科学理论,进化论迟在19世纪80年代已被初步介绍到中国。有学者指出,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初期,主要由西方传教士作为一种自然科学知识介绍进来。它仅仅是这个时期输入的西方近代地质学和生物学理论之一,并没有得到中国知识界的特别重视^⑨。进

①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1页。

②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

③ 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④ 沈松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兼论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政治社会哲学评论》(台北)2002年第3期。

⑤ 参见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⑥ 皮嘉佑:《醒世歌》,《湘报》第27号,1898年4月6日。

⑦ 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

⑧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⑨ 鲁军:《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其哲学影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编《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文集》,1982年,第184页。

化论能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与严复的系统翻译和引申阐发有大关系,“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①。

到了20世纪初,进化观念逐渐上升为“天演哲学”,梁启超视之为“天地公例”^②。这种进化论的意识形态在晚清报刊上的表达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数年之间,许多进化名词在当时报章杂志的文字上,就成了口头禅。无数的人,都采来做自己的和儿辈的名号,由是提醒他们国家与个人在生存竞争中消灭的祸害”^③。在报刊中,对进化观念的表述与演绎总是与当下中国在世界中的处境相提并论,“泰西”、“万国”、“世界”的概念常常与“天演”、“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联袂而至。“世界”与“天演”成为20世纪初国人认知中国的时空坐标。

在1901年的《国民报》创刊号上,《原国》一文在论证“国”“是什么”之前,以讥讽、沉郁、悲愤的复杂笔调论证“国”“不是什么”：“亚西亚之东,有大地焉”,“凡其地重大之事,执其权者无一而非白人”。“然其土人冥然罔觉,自称其地曰‘中国’。其实濒海之东,既不可谓‘中’;偷生苟活,更无以为‘国’。国民曰:是所谓土地也,非国也”。“土地之上,忽有霸王焉,用其兵力窃土地以为霸王有……此秦、汉、唐、宋、元、明等号所由来也。然所谓秦、汉、唐、宋、元、明者,一家之谓也;其争夺相杀,循环无已,皆一家之私事也。国民曰:是所谓朝代也,非国也”^④。作者运用现代地理学知识和国家主权理论解构了传统“天下”观和历史观,也毫不留情地击碎了“冥然罔觉”的传统“中国梦”,土地不是“中国”,朝代也不是“中国”,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时空情境。

创刊于1902年的《大陆》在第一期中登载了两篇文章,分别从空间、地理层面与物种、国家、文明流变层面来“建构”中国的时空环境。

《“大陆”发刊词》首先比较亚洲大陆各国之处境,称“印度也,缅甸也,安南也,琉球也,此已亡之国,无足论者也;亚刺伯也,阿富汗也,卑鲁芝也,尼泊尔也,不丹也,此附庸之国,无足论者也。波斯、暹罗号称独立,不足恃也;西伯利亚荒寒不毛,不足恃也;土领亚细亚,游牧之族,不足恃也。故亚洲特出之国,莫如日本三岛,此人所共认也”。在此基础上,作者大胆推断:“亚洲可望之地,实莫如支那大陆,此吾所敢言也。”其后,作者又放眼世界,说“吾尝观于欧罗巴大陆而慕之”,欧洲大陆在经历过黑暗统治之后还能“山河重秀、大地再清”,作者由此也看到了中国未来之希望:“呜呼,欧洲之大陆如是,我支那之大陆可以兴矣!”而非洲大陆则令作者“未尝不为之流涕也”,“非洲之大陆如是,我支那之大陆可以鉴矣!”^⑤《淘汰篇》一文以较为宏阔的视野解说天演理论,从自然淘汰、人为淘汰、阴阳淘汰一直讨论到国家淘汰、人种淘汰、文明淘汰,其核心观点仍是在提醒人们“适者存”、“不适者灭”的道理^⑥。这两篇文章具有“互文”意义,显示了“世界”观念与“进化”观念共同组成20世纪初国人生存环境的时空定位坐标。

梁启超谈到《清议报》的特色有数端: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所谓“厉国耻”,“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⑦。

《云南》杂志发刊词开篇赞叹“为世所惊羨”的云南之美,然而,“此大好河山、极乐世界,遂不幸成福兰克、萨克孙两族相争之焦点”,“地中海北之碧眼黄发儿”挟其“远洋殖民之政策”,“各争要区”。在此情境之下,“物竞

① 《迷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第2号,转引自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0页。

② 梁启超:《论进步》,葛懋春、蒋俊编《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10页。

③ 胡适:《我的信仰》,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第90页。

④ 《原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5月10日。

⑤ 《“大陆”发刊词》,《大陆》第1期,1902年12月。

⑥ 《淘汰篇》,《大陆》第1期,1902年12月。

⑦ 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词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期,1901年12月21日。

天择,优胜劣败,适者为优,不适为劣,天演之公例也”^①。呼吁民众觉醒,起而救亡。

《时报》之所以名为“时”,正是取自“适者生存”之“适”,意在表达“不适焉者,或虽优而反为劣;适焉者,或虽劣而反为优,胜败之林在于是矣”。“命之曰《时》,于祖国国粹,固所尊重也,而不适于当世之务者,束阁之。于泰西文明,固所崇拜也,而不适于中国之程度者,缓置之”^②。

从“天下”到“万国”和“世界”,中国人在与其他民族打交道的过程中,真正弄清了自己的位置。由历史循环论到历史进化论的转化,中国人拥有了线性时间的历史概念,也由此而了解了时代发展之大势——“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使得现代中国的时空观和世界观与传统中国全然不同。发现“世界”是为了认清自己,熟悉“天演”是为了鉴往知来。晚清报刊的时空转换、时空想象和时空表达,同时也催生着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的形成。那么,新知识群体又是为着何种目的,如何通过报刊来使“想象中国”成为可能的呢?

四、“去塞求通”,“改造国民”, “言论报国”:晚清报刊国族 想象的舆论造势

事实上,在清廷没落、列强环伺的时代,大多数报刊都是为着“救亡”、“强国”、“富国”、“报国”、“立国”等目的而创立的,办报办刊理念几乎都是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做言论准备。

梁启超在1896年《时务报》的创刊号上纵论报馆“去塞求通”功能,其“通”的含义包含通“上下”与通“内外”：“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

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③

严复创办《国闻报》是为使读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④。

“通”的目的是为了在“万国”之中找到国之位置，进而实现国之强盛。没有“他族”就没有“我族”，同样，没有“他国”也没有“我国”。在万国并立、齐州同室的时代，“不通”无异于无耳目、无喉舌，进而可能伤手足、废脑府。因此，“通”成为“想象中国”的前提。而报刊正是“通上下”、“通内外”的重要渠道。

家国危亡之时，更有不少报纸的办报宗旨是重新树立国族认同，或从培育“国民”入手建立“民族国家”。创立于1900年的《中国日报》从“中国”二字入手，申明自己的主张：“报胡为以‘中国’名也？盖报主人生长中华，心怀君国，幼从师而肄业，既熟知中国古今，壮游学于外洋，复稔识中国利病。目击自中外通商以来，交际之道，中国固懵然无知也；公法之理，中国亦茫然罔觉也；立和约，则中国尽失自主之权；争均利，则中国尽丧自有之益；疆土日从剖削，屏藩亦尽叛离。遇事掣肘，积弱难振。”“因思风行朝野，感格人心，莫如报纸。故欲借此一报，大声疾呼，发聋振聩，俾中国之人尽知中国可兴，而闻鸡起舞，奋发有为也。遂以之名其报”。报主人希望通过这份报纸，使中国人“明外交之道，不为邻邦所挠，致沦于危亡”，“识内治之理，不为旧制所牵，致即于贫弱”^⑤。

1903年，《国民日报》创刊词直指“国民”精神之重塑，以利国家民族之重生：“呜呼！

① 《云南》杂志发刊词，《云南》第1号，1906年10月15日。

② 《时报》发刊词，《时报》创刊号，1904年6月12日。

③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第1册，1896年。

④ 严复：《〈国闻报〉缘起》，《国闻报》创刊号，1897年10月26日。转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

⑤ 《中国报》序，《中国日报》第1期，1900年1月25日。

中国报业之沿革如是,国民之程度如是,而欲蔚成一种族,吸取民族之暗潮,改造全国之现势,其殆不能乎?……以此报出世之期,为国民重生之日。”^①

有“国家”才能有“国民”,有“中国”才能有“中国人”。在帝制结构的传统中国,没有所谓“国民”和“国人”,有的只是“臣民”、“子民”、“乡民”甚至“蚁民”。国民是被国家所塑造出来的,也是被民族主义理念所召唤的。晚清报刊力图通过唤醒民众成为“国民”,进而塑造“国民”的国族想象和民族认同,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建国”。

国民素养之提高端赖思想之改良,因此,《云南》杂志发刊词开篇感叹:“呜呼!《云南》杂志!《云南》杂志!!是云南前此未有之创举,而今日之救亡策也。”文章痛惜云南的大好河山被远洋殖民者“鹰瞵虎视”,“势力范围之图,只见法国之云南,不见中国之云南也。环球万国之心只知法国之云南,不知中国之云南也”。如何改变这种状况?自然要从根本上改变国人的“性质行为”。“思想者,万事之根本也”。所以,救亡之策,唯有改良思想,使国人学习优胜民族之思想,才能在物竞天择的竞争中不致归于劣败,不致受他人之侮。作者接下去论述,改变思想的途径有两种:曰学校,曰新闻杂志。至此,创办杂志的目的已经非常明了——“本编宗旨改良思想”^②。

改良思想需依靠正确的言论、观点。1903年,《国民日报》极有先见之明地提出“言论为事实之母”、“观念为言论之母”:“有足为事实之母之言论,必先有为言论之母之观念。所为民族之观念是也。……哀哀我同胞,谁非民族,而吾民族之观念何在?”^③报刊正需要致力于正确言论和观念的输送,以言论救国。

于右任创办《民立报》,认为“独立民族”、“独立国家”、“独立言论”相依为命,试图以言

论救国:“是以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独立之言论。再推而言之,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独立之民族;有独立之民族,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言论也,民族也,国家也,相依为命。”在内忧外患相逼而来的情势下,报馆同人只能以言论报国,“不敢以讹言乱国是,不敢以浮言伤国交,不敢以妄言愚弄国民。所自期者,力求为正确之言论机关而已”^④。

同样追求言论报国的还有狄楚青的《时报》。林语堂在1936年高度评价这份报纸,称“《时报》的编辑方针别开生面,它在业务上的改革,令当时的新闻界耳目一新……但最重要的是,与其深思熟虑的办报计划相辉映,狄楚青及其同仁为《时报》成功地注入了爱国精神、理想主义和真正的进步视野”^⑤。

近代中国的新知识分子们固然通过报刊传播新知、教育国民,重塑现代知识话语体系,但其根本目的,无非是希望以“通上下内外之情”强国,以培育“国民精神”建立民族国家认同,以“改良思想”救国,以“正确、适宜”之独立言论报国。他们孜孜以求的是,有朝一日,“吾国家能在地球诸国中占最高之位置”^⑥。此种救亡一强国话语中,既包含着对地理空间及主权意义上的“国家”之“想象”,更蕴含着对文明、文化意义上的“国家”之“回忆”,隐隐可见对中华文明盛世的追怀与感念。晚清报刊在这样的办报办刊理念中,为进一步的民族主义叙事做舆论铺垫。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民族主义与现代性具有“共谋”关系,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相伴而生,相得益彰。18世纪,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产生,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伴随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而逐渐形成。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儒教传统久远的“文化帝国”来说,其现代性的开

① 《国民日报》发刊词,《国民日报》第1期,1903年。

② 《云南》杂志发刊词,《云南》第1号,1906年10月15日。

③ 《国民日报》发刊词,《国民日报》第1期,1903年。

④ 于右任:《民立报》发刊词,《民立报》创刊号,1910年10月11日。

⑤ 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刘小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2~113页。

⑥ 《时报》发刊词,《时报》创刊号,1904年6月12日。

端与民族认同的觉醒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鸣中产生的,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更为复杂、漫长和迂回往复。

中国在近代以前并无现代民族国家,有的只是以文明为统治基础的传统帝国。在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之中,由身而家而国而天下,是一个文化道德涵养不断外推的过程。梁启超曾在《新民说》中指责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①。梁漱溟指出,“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②。被中国人轻忽的恰恰是“国”。“国家”与“家国”内涵指向的一致性,揭示了古代中国人意识中“家”与“国”的同

构性——国家是整合所有家族之政治实体,“国”不过是“家”的同构放大而已。与此相对,早在中世纪,西方的国家观念就与立法权紧密相联,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正是在把国家(state)等同于主权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③。在中国,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独立、国家主权观念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方才逐渐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晚清报刊不仅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新知识分子们也通过报刊进行民族国家认同的观念启蒙和舆论造势;报刊是“想象中国”的思想载体,也是“想象中国”的动力和引擎。在其后的一次又一次民族革命和运动中,报刊的作用被发挥到极致。

The Pres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Reflected in the Idea of “an Imagined China”

JIANG Hong

Abstract: The late Qing dynasty witnessed a surge in nationalism as a result of the boom of new intellectual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ress and the shaping of press styles. In those days, the press transformed the image of china from “a supreme regime under heaven” to “a country among the world of nations”. With the help of the press, modern Chinese came to realize the evolutionary rather than cyclical natur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press was expected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empire and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to establish a national identity by cultivating national spirit, to save the nation by transforming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to serve the country by taking an independent and appropriate stance. All of these endeavors aimed 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nation and the propagation of “an imagined China”, which made the press the engine and vector for the boom of nationalism.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modern press; nationalism; nation state; national identity; modernity; newspaper history; journalistic history

JIANG Hong, professor and doctor of literatur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责任编辑:张朝胜

① 梁启超:《新民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页。

②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3页。

③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229~231页。